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人际责任归因的作用

作者：杨昭宁，顾子贝，王杜娟，谭旭运，王晓明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力图探讨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并探究人际责任归因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该课题立意新颖，分析方法得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现仅就方法和行文上的几个问题与作者商榷。

意见 1：在“引言”的第三段，作者指出“在经济决策中，悲伤个体和厌恶个体在购买和销售价格的决策中存在差异(Lerner, Small, & Loewenstein, 2004)”。此处，作者最好简要的介绍一下差异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已对差异进行说明。请见“引言”第 3 段。

意见 2：作者有两处笔误：“愤怒比悲伤情绪能够诱发更多的助人决策”。一处在第 5 页第一行“假设 1”。另一处在第 9 页第三行。

回应：对于写作上的笔误我们感到十分抱歉。已在对应的位置进行修改，并通读全文，以排除笔误的存在。感谢审稿人的提醒！

意见 3：在第 9 页第一段，作者用人际责任归因来解释实验一的结果。在此处，作者最好联系实验一的具体实验材料进行解释。例如，由于愤怒/悲伤情绪，被试如何对“研究者需要帮助”进行人际责任归因，进而决定是否提供帮助。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供的非常细致的建议。我们结合实验一的具体实验材料，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以及当时实验后不同情绪条件下被试的回馈，我们进行如下解释“就本研究而言，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对“研究者需要帮助”进行“这是研究者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的人际责任归因，从而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会更少；而悲伤个体或许更倾向于对“研究者需要帮助”进行“研究者想顺利完成研究设计，的确不是一己之力就足够”的人际责任归因，从而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更多。详见：2.4 讨论第 2 段。

意见 4: 正如作者在第 11 页第一段所述, 实验二“助人决策情境中的人际责任归因可能会作用于个体情绪”。因此, 被试决策时的情绪“并不完全是情绪 (incidental emotions) 诱发的结果”。所以, 建议作者在实验二的预实验 (人际责任归因有效性检验) 中加入两个因变量: 愤怒、悲伤。如果人际责任归因所带来的这两种情绪没有显著差异, 才能说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的是同一种情绪。否则, 很难分离究竟哪种情绪在起作用。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对于此意见, 我们认为:

首先, 实验二的目的是探究人际责任归因在愤怒、悲伤这两种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中的作用。基于前人研究所发现的无法将二者分离的情绪与归因间的相互关系 (Major, 2011; Quigley & Tedeschi, 1996; Weiner, 1980), 两种不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若影响了决策者原有的情绪状态, 从而影响决策者最终的助人决策, 既达到了本研究的目的, 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这表明虽然个体附带的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 但助人决策情境中的人际责任归因可以产生情绪作用于个体附带的情绪。原文中已对其进行讨论, 详见: 总讨论第 3 段。

其次, 对于审稿人关于“如果人际责任归因所带来的这两种情绪没有显著差异, 才能说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的是同一种情绪。”的建议, 由于原有数据 (人际责任归因有效性检验) 中确实没有这部分数据可用, 所以我们为了尽可能地说明这一问题, 对人际责任归因材料重新收集了以愤怒和悲伤为因变量的数据。此外, 结合上一条回应, 我们认为如果个体在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中, 诱发的愤怒和悲伤情绪结果不存在差异, 并且在这种情境下, 若仍然表现出悲伤个体的助人决策显著多于愤怒个体, 该结果即可以说明: 采用相同情绪诱发任务的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的是同一种情绪。因此, 我们补充了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 愤怒和悲伤的诱发结果。详见: 3.2.1 中第 2 段操纵部分, 3.3.2 助人决策结果报告部分最后一段。

意见 5: 作者在第 12 页第二段, 作者应讨论以下结果说明了什么:

“在愤怒情绪条件下, 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存在显著差异, $F(2, 67) = 51.80, p < .01, \eta_p^2 = .61$; 情境和不可控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 ($M = 52.57, SD = 4.94$) 显著多于模糊组 ($M = 7.77, SD = 4.16$)、自身人为和可控归因组 ($M = 1.94, SD = 1.89$), $p_s < .01$, 模糊组、自身人为和可控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5$ 。在悲伤情绪下, 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影响捐赠金钱的数额, $F(2, 67) = 73.01, p < .01, \eta_p^2 = .69$; 情境和不可控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 ($M = 64.29, SD = 4.94$) 显著多于模糊组 ($M = 35.14$,

$SD = 4.16$)、自身人为和可控归因组($M = 6.83, SD = 1.89$)，模糊原因组显著多于自身人为和可控归因组($MD = 28.31, SD = 3.73$)， $\text{all } ps < .01$ 。”

这些结果是对不同情绪条件下捐赠金钱的总结。在逻辑上并不能得出“在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在归因清晰时，情绪不会影响助人决策。”这个结论。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首先，如审稿人所言，以上这些结果是对不同情绪条件下捐赠金钱的报告，这是交互作用显著后的另一方向上的分析，事实上这一结果说明了不同情绪条件下人际责任归因对捐赠金钱这一助人决策的主效应，具体表现为情境和不可控这一清晰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被试捐赠金钱数额最多。这一结果的意义并不是我们研究的关注点，但是我们在报告数据结果时考虑到不报告是不是不妥当，所以在此进行了报告。

其次，在实验二中，我们主要关注人际责任归因对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具体情绪与人际责任归因交互作用显著之后，首先报告了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条件下，愤怒和悲伤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模糊原因组被试在不同情绪条件下捐赠的金钱数额存在显著差异， $F(1, 68) = 21.69, p < .01, \eta_p^2 = .24$ ，悲伤组捐赠的金钱数额显著多于愤怒组($MD = 27.37, SD = 5.88$)。在情境和不可控归因组[$F(1, 68) = 2.82, p > .05$]、自身人为和可控归因组[$F(1, 68) = 3.30, p > .05$]，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均不受情绪的影响。”据此，我们得出“当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愤怒和悲伤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当人际责任归因清晰时，个体的助人决策主要受人际责任归因情境的影响。”的这一结论。上述“在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在归因清晰时，情绪不会影响助人决策。”的结论，确实存在逻辑不严谨问题，我们结合审稿人 3 的意见 2 已将其删除（见 3.3.2 第 3、4 段），只在“3.4 讨论”第 1 段给出结论。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实验 1 的结果表明，悲伤情绪下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长于中性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积极情绪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和行为，消极情绪个体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或行为的可能性更小(Tsai, Chen, & Liu, 2007)）可能存在矛盾。既然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负相关，为何悲伤比中性组产生的亲社会行为更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建议作者在讨论部分对此进行探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提醒和建议。我们已在讨论部分对此进行说明。

我们在引言部分提及“Sharma (2015)采用相关研究法，探究大学生群体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积极情绪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和行为(Tsai, Chen, & Liu, 2007)，消极情绪个体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或行为的可能性更小。”，该研究采用 NA 分量表来测量消极情绪，测量项目涵盖愤怒、耻辱、憎恶、负疚、恐惧和紧张等情绪(张卫东, 刁静, Shick, 2004;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这些情绪并不同于悲伤。根据 Smith 和 Ellsworth (1985)的研究，作为评价维度的责任性和控制性对了解决策动因最具有独特作用，与上述的几种情绪相比，悲伤是属于唯一一种以情境责任和不可控维度为核心评价主题的情绪，而这些也正是可能促使个体作出助人决策的原因。我们与相关研究所发现的“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负相关”结果不同，恰好说明了不同具体负性情绪对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的预测作用。详见：4 总讨论第 2 段。

意见 2：积极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关系应是基于情绪的强度（intensity）得出的，即积极情绪强度越高，亲社会行为越高。因此，情绪强度可能是影响助人决策的因素之一。那么，通过本文方法启动的悲伤和愤怒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强度？若存在，这种强度是否是情绪具体内容之外影响两者对助人决策影响的差异之一？建议作者在引言中补充相关文献，或在讨论中就该问题进行讨论，或通过实验证明（或排除）情绪强度的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根据前人以具体情绪为自变量的相关研究(Lerner, Gonzalez, Small, & Fischhoff, 2003; Ford, Tamir, Brunyé, Shirer, Mahoney, & Taylor, 2010)，在情绪操作性检查上，我们采用了相近的数据分析和相同的数据报告方法。对此，我们没有对实验一中的情绪操作性检查部分进行修改。

但是，我们认为审稿人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和有意义。我们仔细查阅了具体情绪与判断、决策方面的相关文献，的确，如审稿人所言，情绪的不同强度会存在不同影响，如 Keltner, Ellsworth, Edwards(1993)在研究中发现，不同强度的愤怒和悲伤、不同强度的愤怒情绪、不同强度的悲伤情绪均会对不同的社会知觉、判断、决策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强度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并且，根据前人研究，为诱发不同强度的具体情绪，可以采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来操纵。鉴于目前的研究主题和实验完成情况，我们在未来研究中会予以考虑推进。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了该部分内容的说明。详见：4 总讨论最后一段。

意见 3: 根据作者在文献综述中对 Small 和 Lerner (2008) 研究的总结, 本研究的实验 1 与该研究主要自变量, 情绪启动方式及结论均一致, 那么实验 1 与前人研究的不同在哪? 请说明。

回应: 不同主要在于: 所采用的助人决策任务。Small 和 Lerner(2008)的助人决策任务中, 将被试假定为福利政策制定者, 而实验 1 中被试是处于真实的助人决策情境中, 二者类似于虚假的 vs.真实的决策情境, 代替决策 vs.为自我决策的关系。有研究表明, 逼近真实决策和虚拟决策情境结果会存在不同(徐四华, 方卓, 饶恒毅, 2013), 代替决策和为自我决策结果会存在不同(刘永芳, 王鹏, 庄锦英, 钟俊, 孙庆洲, 刘毅, 2014)。因此, 与 Small 和 Lerner(2008)的研究相比, 实验 1 更贴近真实情境, 生态效度相对更高, 一定程度上重复并延伸了 Small 和 Lerner(2008)的研究。我们已在引言 (1 引言第 5 段) 和讨论 (4 总讨论第 2 段) 部分进行简单说明。

意见 4: 在已有的前人研究结果矛盾的情况下, 假设 1 提出的理论依据不足, 且与假设 1 所在段落的文献综述没有必然关系, 建议补充假设 1 推理过程, 即为什么认为本研究的假设与 Small 和 Lerner (2008) 研究结果一致。

回应: 根据审稿人的意见, 我们重新论证了假设 1 的提出过程, 将原来的假设 1 分为假设 1a 和假设 1b 两部分进行论证, 具体而言, 我们首先根据 ATF (评价倾向框架) 理论提出假设 1a: 愤怒和悲伤会对助人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此后, 我们受审稿人提出的上一条意见的启发, 在说明上一问题的同时, 试图论证实验 1 在逼近真实的、自我卷入更强的情境中可能也会得出与 Small 和 Lerner (2008) 一致的研究结果, 以延伸结果至逼近真实情境中, 据此提出假设 1b: 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不同影响具体表现在, 悲伤个体会比愤怒个体作出更多的助人决策。详见: 引言第 4、5 段。

意见 5: 实验 2 中, 人际责任归因三个水平的命名建议修改的更为清晰些。“模糊、情境和不可控、自身人为和可控”, 乍一看有些难以理解。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结合人际责任归因方面的文献和本研究, 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以下两种命名: “模糊、情境和自身人为” (彭小凡, 谢德光, 张大均), “模糊、不可控和可控” (Weiner, Osborne, & Rudolph, 2010; 张爱卿, 刘华山, 2002), 但是仍然认为目前的命名与本研究操纵的人际责任归因更贴切, 并且也是最准确的。事实上, 在命名时也有考虑

到较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我们尝试通过论文写作让读者阅读后即可明了。详见：在 3.1.3 和 3.2.1 下的文字说明。如果审稿人有更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参考。

意见 6：实验 1 男女比例过于极端。因此，即便基于 4 名男生和 81 名女生得出性别差异不显著，助人决策的性别差异仍无法被有效控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提醒，我们特查阅了助人决策、亲社会行为在性别方面的文献。

首先，男女性别不平衡地问题，虽然很极端，但是在取样地（研究者所在地）客观存在，在本研究中的这一问题目前无法很好解决。其次，我们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愤怒和悲伤两种具体的负性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助人决策的性别差异不作为研究重点。再次，虽然男生极少，但我们在女生较多的情况下依然发现了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不同作用，我们认为这种样本选择可能并不足以成为推翻研究结果的条件。最后，这确实是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的不足，经审稿人提醒，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方向。在未来研究中，可以主要关注在不同的助人决策上的性别差异。我们已在讨论部分对被试样本方面的不足进行说明。详见：4 总讨论最后一段。

意见 7：除礼品外，实验 1 的被试是否获得课程实验学时或金钱奖励？礼品或奖励是否在实验前承诺被试？实验 1 的助人情境下，被试是否清楚帮助他人是无偿的，不会获得任何形式的物质奖励或课程奖励？若是，请在文中说明，若不是，则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可能掺入利他以外的其他因素。

回应：（1）除礼品外，实验 1 的被试并不获得任何课程实验学时或金钱奖励，这一点在原文已表述清楚；（2）礼品或奖励并没有在实验前承诺被试；（3）我们在招募被试时并没有说明会提供任何奖励，因此我们认为：实验 1 的助人情境下，被试清楚帮助他人是无偿的，不会获得任何形式的物质奖励或课程奖励。第 2、3 点我们在文中实验 1 的“2.2 实验程序”第二段最后进行了补充说明。此外，我们认为实验后向被试赠送小礼品时，被试表示很吃惊和不要礼品的行为也能说明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可能并没有掺入利他以外的其他因素，或者说掺入利他以外的其他因素相对较少，比较接近真实情境。

意见 8：不显著无需报告效应量。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提醒，建议已采纳。

意见 9: 实验结果由文字、图、表三部分重复表达，且实验 1 的三种呈现方式中，愤怒，悲伤和中性呈现顺序均不同。建议在详细描述数据的前提下选择尽可能少的表达方式。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意见已采纳，实验 1 和实验 2 均只采用文字呈现方式。

审稿人 3 意见:

文章探讨了悲伤和愤怒情绪对帮助决策的影响，以及人际责任归因所起的调节作用。正如作者所言，较少文献涉及相同价效下的这两种情绪对帮助决策的影响，有关人际责任归因所起的调节中介作用也值得探讨。鉴于此，建议录用发表。

此外，文章尚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需要加以完善：

意见 1: 假设 1 应为“悲伤比愤怒情绪能够诱发更多的助人决策”，而非“愤怒比悲伤……”。在“2.4 讨论”中也有类似不一致的表述。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提醒！对于我们写作上的笔误我们感到十分抱歉。已在对应的位置进行修改，并通读全文，以排除笔误的存在。

意见 2: 图 1 和表 1 没有必要再列出了，因与文字部分表述了相同的统计结果。此外，在“1. 引言”部分中的一些假设和在“2. 实验 1”部分中的一些经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不断地重复表述。文章因言简意赅，减少这些反复而相同的论述。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建议。其一，由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确实存在审稿人所说的结果表述重复的问题，我们已将图 1 和表 1 删除。其二，在审稿人的提醒下，我们整体阅读了全文，对一些没必要的重复的论述进行删除，但有些部分我们认为重复论述是有必要的。如果审稿人对此仍然有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虑。

意见 3: 实验 1 尚未引入“人际责任归因”这一情景变量，但在该实验的“2.4 讨论”部分提出了“愤怒和悲伤具有不同的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愤怒个体认为事件当事人对事件结果负有责任，在当事人的努力下事件结果可控，即当事人自身原因导致了事件结果；对于同一事件，悲伤个体倾向于认为环境是产生当下事件结果的原因，事件的发生对当事人而言不可控(Keltner et al., 1993; Smith & Ellsworth, 1985; Yang & Tong, 2010)”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尚未在实验 1 中加以验证。

回应：是的，如审稿人所言，实验 1 并未引入“人际责任归因”变量。我们现从以下两方面对审稿人的问题进行说明。

第一，我们的研究基于具体情绪新理论——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根据“1 引言”中的第 4 段，该理论主张“每种情绪都有其特定的认知评价维度，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评价维度是特定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个体主要通过特定情绪核心评价主题所激发的评价倾向进行决策。”，而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恰好就是 ATF 理论所包含的两种维度，愤怒和悲伤确实在这两个评价维度下是处于各自维度的两端(Smith & Ellsworth, 1985)，而结果也的确表示存在该理论所能解释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看，该部分的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是指 ATF 中的两个维度。

第二，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这两个维度恰好也能够体现在人际责任归因中，因此在实验 1 的讨论部分呈现审稿人所说内容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提出实验 2，这也是该研究整体上为何探究人际责任归因在具体情绪愤怒和悲伤与助人决策关系中作用的原因之一。可参见：1 引言第 4、6、7 段。

意见 4：英文摘要有大量语法，语句结构或用词方面的不妥当之处，有些句子过长。以下尝试修改了一下有关语法方面的不妥之处，仅供参考。此外，最后总结（b）部分的内容不太清楚，需要重新叙述一下。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emotions have an effect on helping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emotional valence, but little research has verified the role of discrete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Based on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one's incidental emotions carry over to influence helping decision making, to explore whether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have opposing effects on helping decision making,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se relationship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performed two experiments. To explore discrete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and different appraisal dimensions which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elping decision, experiment 1 conducted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in which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gry, sad, or neutral conditions and were asked to record time spent on others. To extend the domain of helping, we furthermore explore whether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in which discrete emotions influence helping decision. Therefore, in

Study 2, we conducted mixed design of 2 (emotions: anger/ sadness) \times 3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mbiguity/ external situation/ internal self), in which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angry or sad condition and made decision about the money spent on others. The current study used the Autobiographical Emotional Memory Task to induce emotions and to manipulate helping decision and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by situational tasks.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was measured by an 11-point bipolar scale.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ed that: (1) Participants spent more time and donated more money for othe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adness when comparing with the angry and neutral conditions.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mbiguity situation, the sad participants made more decisions for helping compared with the angry condition, where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laming for recipients themselves or situation,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ntrol and uncontro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between angry and sad conditions on helping decision. (3) Under the sad condition, the money spent for others was the mos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ternal situation, then under the ambiguity situation, and the leas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laming for recipients themselves. Under the angry condition, the money spent for others was the mos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ternal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ditions of ambiguity and blaming for recipients themselves.

In sum,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and different appraisal dimensions have the opposing effects, (b) personal emotions carry over to influence helping decision, and sadness associated with strong attributions of situational agency and circumstance-responsibility/ control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assistance while anger associated with extreme attributions of human agency and other-responsibility/ control decreased, and (c)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es to such effect, in which under the ambiguou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ger and sadness have an opposing effects on helping decision while not under the unambiguous situation.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给出的修改建议。同时，对于英文摘要中出现的语法、语句的错误，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根据审稿人的建议进行了修改，并又经过英语水平较高人士再次把关。再次感谢！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这一稿比起前一稿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有几个行文和方法上的问题与作者商榷。

意见 1：第 15 页“引言”中，“……在经济决策中，悲伤个体和厌恶个体在禀赋效应中存在差异”。如果提供“禀赋效应”的英文翻译，读者更易理解。

回应：已提供英文翻译(endowment effect)。详见：第 15 页第 2 段。

意见 2 和 3：

2. 第 15 页“……因此，愤怒和悲伤两种负性情绪对助人决策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假设 1a）。”此处，作者应该在假设中明确有什么不同的影响。例如，与愤怒相比，悲伤会引起更多(或更少)的助人决策。

3. 第 16 页“假设 1b”：作者的措辞听上去像是对 Small 和 Lerner (2008)的研究结果的重复，不应称为假设。建议删除该假设。如果不是重复，请具体说明现在的这个研究与 Small 和 Lerner (2008)的研究理论差异在哪里。例如，Small 和 Lerner (2008)的研究是针对“对政策的支持”，我们的研究是针对“对一个具体人的帮助”。

回应：鉴于以上两点意见都与假设的提出有关，我们对此一并答复，具体而言：（1）我们已在“1 引言 第 4 段”最后补充具体的影响，并适当增添了一些内容，以结合一审中的意见，让假设的提出更为充分。（2）非常感谢审稿人提供的建议，我们已在“1 引言 第 5 段”进行修改，并从整体上，在适当的位置调整了一些关于本研究助人决策情境的表述，正文部分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意见 4：第 21 页“实验二 操作检验”中，作者“对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愤怒和悲伤的结果”进行操作检验，这个改进很好。但是，作者还应检验被试在进行人际责任归因后，被试的愤怒和悲伤是否在这三种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没有显著差异。如果是，作者可以下结论：附带情绪(incidental emotion)影响助人行为。否则，被试的助人行为决策可能是附带情绪与直接由人际责任归因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提醒。我们重新补充了“对被试在两种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下愤怒结果、悲伤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详见：3.2.1 中第 2 段操纵部分；3.3.2 助人决策结果报告部分最后一段）。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的助人行为决策是附带情绪与直接由人际责任归因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际责任

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机制是：个体在对事件结果做出归因后，会产生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则进一步诱发了最终的决策和行为(Quigley & Tedeschi, 1996; Schmidt & Weiner, 1988)，而个体原有的情绪可能受到归因结果所产生情绪的影响(Winterich, Han, & Lerner, 2010)，最后作用于助人决策（详见：4 总讨论第3段）。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我的问题做出了较好的回应以及适当的修改。但目前仍存在如下问题：

意见 1：经过修改，作者明确了实验 1 与前人实验的差别，并指出实验 1 的主要意义在于“更接近真实情境，生态效度更高”。这一点虽然使实验 1 的目的更加明确，但有些搅乱整篇文章的结构，弱化了实验 2 和实验 1 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弱化了原本更具有理论意义的实验 2 的结论。

具体来讲：若实验 1 的主要目的是用更接近真实情境的实验设置重复前人的结果，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对实验 2 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和实验 2 存在递进关系？若存在递进关系，为何实验 2 不应用该真实情境，而又回归到前人的实验设置上呢？目前看来，似乎实验 2 建立在前人研究结果，而非实验 1 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请作者斟酌两实验间的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提醒，我们结合审稿人 1 的意见，对实验 1 的相关部分进行了重新说明。的确，从逼近真实情境这个角度切入，会影响实验 2 与实验 1 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从助人决策的具体操纵方式——福利政策的支持和针对具体个人提供帮助进行与前人研究的对照，如此，既能够区别前人研究，实验 1 和实验 2 也都在“为具体个人提供帮助”的助人决策情境之下，原有逻辑和递进关系也无需再做调整。

意见 2：在上一轮审稿中，我提到实验 1 男女比例过于极端的问题。我同意作者“这种样本选择可能并不足以成为推翻研究结果的条件”，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法平衡男女比例是可以接受的。但 2.3.2 中写道，“助人决策中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F(1, 83) = 1.77, p = .19$ 。”，我认为在极端的男女比例下仍然进行分析并得出“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并不适当，建议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再次提醒，根据建议以及我们在讨论部分的说明，我们已将“助人决策中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F(1, 83) = 1.77, p = .19$ 。”删除，仅保留讨论部分的相关内容。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实验二的设计仍然有问题。就像在上一次给编辑部的反馈中所说,实验二中被试情绪的来源有二:一个是诱发的情绪,另一个是对人际责任归因所引起的情绪。作者仍然没有对这两个来源进行分离或者平衡(或者根本无法控制或平衡?)。这样作者就不可以下结论说助人决策是由诱发的附带情绪(incidental)引起的。就像作者自己所说,被试的决策是“人际责任归因条件分别产生的愤怒和悲伤情绪与附带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共同作用”结果。如果作者不能修改研究设计,对两种情绪进行分离或控制,那么该文章不能在心理学报这种高档次的期刊发表。建议退稿。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审稿人提出的实验设计问题在实验二中的确存在,被试的决策确实是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产生的愤怒和悲伤情绪与附带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前两次审稿意见中试图在实验程序和结果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考虑到本研究当下的情况,我们认为在后期研究中可以尝试对两种情绪来源进行分离。对此,我们在讨论(详见 4 总讨论第 3 段)部分对这一不足作了相应说明。

此外,本研究的结论是: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在助人决策上的作用不同,悲伤个体比愤怒个体作出更多的助人决策;人际责任性归因会影响附带情绪和助人决策的关系。本研究所进行实验二的设计中,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决策者原有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与实验一相同,两种不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影响了决策者原有的情绪状态,从而影响决策者最终的助人决策,不仅证明了本研究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这表明虽然个体附带的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但助人决策情境中的人际责任归因可以产生情绪作用于个体附带的情绪。

同时,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实验二的设计并不影响研究结论,我们查证了其他研究者所进行的有关情绪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审稿人所提出的在因变量的作用上情绪来源有二类似研究是存在的,比如,Zemack-Rugar, Bettman 和 Fitzsimons(2007)发现,个体附带的悲伤和愧疚情绪对行为存在不同影响,个体自身具有的不同特质情绪愧疚会与个体附带情绪共同作用于行为。详见:Zemack-Rugar, Y., Bettman, J. R., & Fitzsimons, G. J. (2007). The effects of nonconsciously priming emotion concepts on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6), 927-939.

综上,我们认为通过现有的实验设计得出“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在助人决策上的

作用不同，悲伤个体比愤怒个体作出更多的助人决策；人际责任性归因会影响附带情绪和助人决策的关系。”的结论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对审稿人的认真负责和耐心指导再次表示由衷敬佩和感谢！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了恰当的修改。修改后的论文与初稿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没有其它问题了，建议发表。

第四轮

编委专家意见

意见 1：经过几次修改，文章总体上有明显的提高。评审专家也对修改基本满意。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在于实验二中两类情绪（i.e.:附带的情绪以及归因引发的情绪）的分离和解读。对此作者做了一些处理和解释。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因为现有的实验方法没有在设计上对两者进行有效分离。所以作者需要就实验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比如，责任归因清晰的情境中的行为反映了两类情绪的共同作用；而责任归因不清晰情境中的助人行为，因为没有明显的归因诱发的情绪，则更可能反映了附带情绪的作用。两者相减则突出了归因情绪的效应。

作者在第 12 页中的讨论;在愤怒情绪条件下，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存在显著差异。。。其实也与此有关。归因是否明确，影响了两类情绪的交互效应。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专家，我们接受进行进一步数据分析，以说明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通过诱发情绪作用于附带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建议。我们以情绪为组间变量，以归因情境诱发的情绪(不可控情景归因组和可控自我归因组与模糊情景下助人决策结果的差值)为组内变量，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人际责任归因清晰情境诱发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在两种附带情绪愤怒和悲伤中均存在。该结果更为充分地说明了：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机制可能在于：个体在对事件结果做出归因后，会产生某种情绪，这会影响个体原有的附带情绪(Winterich, Han, & Lerner, 2010)，最后共同作用于助人决策。我们也据此对讨论的相关部分进行了表述上的微小变动。具体详见文中浅蓝色字体部分：3.3.2 助人决策最后一段（正文部分第 11 页最后一段）；4 总讨论第 4 段（正文第

13 页最后一段)。

意见 2: 摘要中: 自变量 2 为组内变量人际责任归因, 操作为模糊、情境和不可控、自身人为和可控三种情境, 以及“愤怒以人为非情境责任和可控维度为核心评价主题, 悲伤以情境责任和不可控维度为核心评价主题”等表述既拗口又不易理解。

可改为操作为模糊、不可控情景因素、和可控的自我因素三种情境。人为非情境责任在给出定义之后, 可直接称为人为责任。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 我们接受变量命名修改的建议, 并已对文中出现的变量命名部分进行相应修改。此外, 也尽可能地兼顾易懂性和术语的专业表达, 对一些表述进行了更详尽地完善和修改。具体详见文中的浅蓝色字体部分(正文第 1、2、8-12 页)。

意见 3: 另外建议, 对主要的实验结果用一两张图表示。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 我们分别对实验 1 和 2 的主要实验结果各补充了 1 个图。详见修改稿中实验 1 和 2 的结果报告部分(正文第 6 页和第 11 页)。

第五轮

编委专家意见

意见 1: 请修改图 1 和图 2。不要用颜色覆盖条形图, 这样看不见 Error Bar 的下端。另外要注明是标准差还是 95% 的可信区间。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 为看到误差线(error bars)下端, 我们对条形图颜色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 我们在图题中对误差线所表示的意思进行了备注,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standard errors)。修改最终图形见下图, 已在文中对应实验 1 和实验 2 结果部分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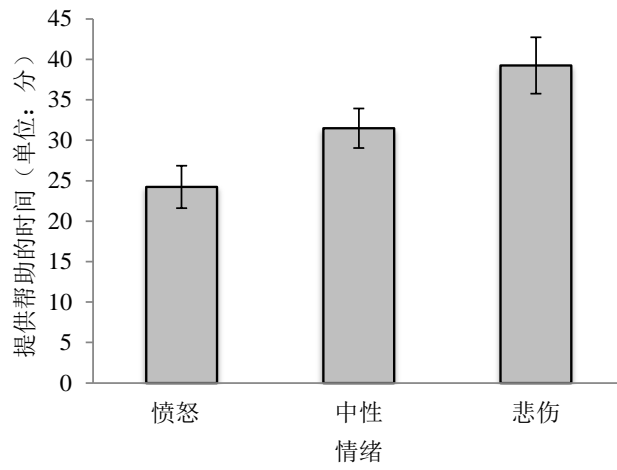


图1 三种情绪下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 (注: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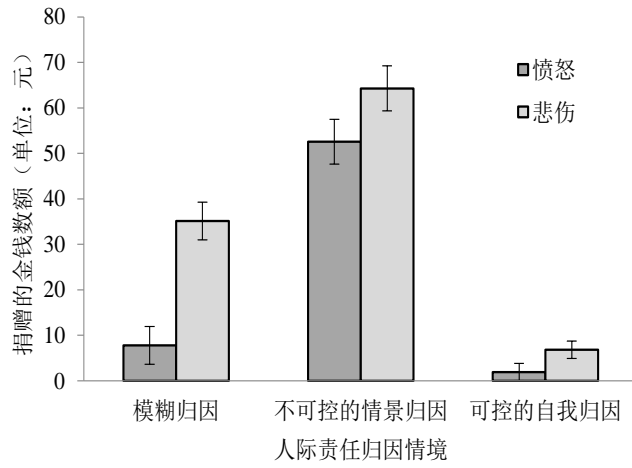


图2 愤怒和悲伤情绪在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捐赠的金钱数额 (注: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